

● 蔡 旭 初

## 改革以来上海经济增长因素的宏观分析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0年，这12年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因素的定量与实证分析角度，对上海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作出测度与评价，以期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 一、经济增长因素的定量测度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商品量和劳务量的增加，即产出量的增加。因而，经济增长的量度应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是最适宜的。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以与国民生产总值最相近的国民收入来替代。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因素，如各生产要素耗费量的增长、单位要素投入产出水平的增长等，还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以外的因素，如政治环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这里只限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dward·F·Denisen）开创的因素分析法，是国际上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考察经济过程中各生产要素作用率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它以产出（附加价值）增长率为经济增长速度指标，通过确定各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来推算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与影响值。

本文参考这种方法，测度和分析改革以来上海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资本和产出各种因素的作用程度，研究范围是指全社会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这种方法是以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为速度指标，通过确定改革以来上海历年各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即各要素收入分配率，各要素耗费量在总要素耗费中所占的比重，即各要素耗费率，以及影响单位综合要素投入产出水平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进行综合权衡，估算出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1、各要素收入分配率。

经济增长的快慢，总是决定于投入社会生产的劳动、资本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决定于它们数量的多寡和生产率的高低。创造国民收入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两大类，即劳动力的投入，企业占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投入。

表1列出了1979～1990年上海市物质生产部门按劳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分类的可用于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额，以及地区流出额。

表1中，国民收入生产额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收入分配额包括劳动者的最终收入和劳保福利支出。由于上海每年国民收入使用额小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因此，从国民收入生产额中减去地区流出净额，再减去劳动收入分配额，剩余的是资本分配额。根据历年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在资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推算出固定资产收入分配额和流动资金收入分配额，然后再根据劳动收入分配额、固定资产收入分配额以及流动资金收入分配额在国民收入

生产额中的比重，计算出各自的收入分配率。

表 1

上海物质生产部门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额

单位：亿元

年 份	国民收入 生 产 额	地区流出额	劳动收入 分 配 额	固定资产 分 配 额	流动资金 分 配 额
1979	262.6	163.1	40.2	36.8	22.5
1980	282.4	154.6	44.3	49.9	33.6
1981	290.9	148.9	50.2	56.9	34.9
1982	295.0	138.3	53.6	64.9	38.1
1983	303.5	159.4	57.1	56.4	30.5
1984	341.2	153.8	74.9	76.1	36.5
1985	409.7	105.4	87.7	141.9	74.4
1986	425.1	64.4	102.7	166.7	91.3
1987	473.6	88.6	128.7	164.5	91.7
1988	566.2	41.1	162.9	232.6	129.7
1989	586.8	44.7	170.8	233.9	137.4
1990	617.2	103.7	190.1	199.9	123.5

结果表明：改革以来，上海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平均为24%，根据丹尼森的计算，本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分配率一般为60~70%，由此可见，上海的劳动收入分配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左右。这里，有统计口径上的差异，使数据的结果相差甚大。虽然在计算过程中，已经把不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各种福利开支计入了劳动收入额，但是，实际上不少应属于劳动收入的支出没有计入，特别是不少“隐蔽性收入”的支出很难统计，也就是说，对劳动收入分配有所低估，但即使计入这些低估的劳动收入分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

从劳动收入分配变化的历史来分析，改革以后，劳动收入的增长幅度较大，特别是1984年以后，连年增长，几乎每年都高于生产的增长，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分配率的不断扩大，从1978年的15.3%增加到1990年的30.8%，提高15.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以1984年出现的信贷膨胀和1985年初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为标志，将改革以来的12年划分为前6年和后6年两个阶段（以下均以此阶段划分，简称“前6年”、“后6年”）。分阶段看，前6年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年平均为18.0%，而后6年提高到27.4%，且逐年上升。就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个要素来分析，流动资金分配率变化大于固定资产分配率，前6年保持在11%左右，1985年以后逐年上升，其中有4年停留在20%以上的水平上，提高近1倍。而固定资产分配率，1988年以后则出现缩小趋势。

## 2、各生产要素耗费指数。

根据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率，对物质生产部门各生产要素耗费指数即劳动耗费、固定资产耗费、流动资金耗费指数进行推算。其中劳动耗费量是以物质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者人数表示的，固定资产耗费是以对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加权平均的结果，而流动资金耗费量是指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量（按理来说，还应包括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因资料不易获取，暂不计入）。然后通过以各要素收入分配率为权数，加权平均后得出总资产耗费指数和综合要素耗费指数。

结果表明：从1979~1990年，上海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耗费平均每年递增0.7%，固定资产耗费平均每年递增12%，流动资产耗费平均每年递增12.8%，综合要素耗费平均每年递增10.4%，与同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2%的速度相比，说明上海的物质耗费率相对较高。分阶段来看：前6年，全市综合要素耗费平均增长5.5%，大大低于12年的平均水平；后6年，综合

要素耗费大幅度上升，年平均增长达到15.5%。这主要是流动资金耗费的大幅度增长，1985年以后，每年以22%的速度递增，而改革前期的6年中只增长4.2%；同时，固定资产耗费指数，后6年每年也达到17%的增长速度，超过前6年9.7个百分点。在这12年中，劳动耗费指数变化微小，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平均人数由1978年601.3万人到1990年只上升到652.6万人，增加51.3万人，其中1983年、1986～1988年均出现负增长，1990年才略有回升。从三要素投入的动态变化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以来，上海经济增长的要素耗费基本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增长状况，但增长速度的明显特征是呈上升趋势，使经济增长处于投入型增长形态。

### 3、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水平。

经济增长的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外延投入的增加，二是内涵效益的增长。这两个方面在经济发展演进中共同产生影响。外延投入是指各要素的投入，而内涵效益则是实际投入与产出之比，即表示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水平。内涵效益主要靠技术进步作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获得。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中运用的资源配置效益、资本效益、劳动效益等指标，对考察我国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水平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根据丹尼森的指标作适当调整，其中资源配置效益采用百元资产生产的产值率来替代；资本效益用物质生产部门的国民收入除以资本总量来表示；劳动效益以劳动生产率即平均每个社会劳动者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来表示。最后，对三个指标进行一般的算术平均，计算出总效益指数，即单位综合要素投入产出水平指数。

其结果表明，改革以来的12年中，上海物质生产部门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水平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分阶段来看，前6年中，投入产出水平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1.4%，而后6年中，已经达到3%，说明上海在合理组合生产要素、提高装备技术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改革工艺和产品方面作出努力，来提高技术进步的总体水平，从而使经济效益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从绝对的水平来看，提高速度还不够快，效益改善步伐还不大。总效益指数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总效益指数的提高幅度不大，是由于资源效益和资本效益呈下降趋势所致。

### 4、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1979～1990年的12年，上海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是由哪些因素所带来的？参照丹尼森的方法，现将各年的总要素耗费指数与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水平指数为权数，对各要素进行分配，然后估算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结果表明：1979～1990年的12年间，上海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2%，其中5.9%是由外延投入的增长所带来，只有1.3%是由内涵型经济要素效益的提高所产生的。在总要素投入增加所带来的5.9%年平均增长率中，由劳动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为0.32%，由资本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为5.58%。同样，在由单位要素投入产出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年平均1.3%的增长中，由于资源配置效益和资金使用效益的下降所损失的增长率分别为年平均0.3%和1.5%，而由劳动使用效益的改善所带来的增长速度为3.1%。进一步分析，由资本投入增加所带动的贡献份额最高，达到77.5%，而劳动投入的贡献份额只占4.4%，但劳动使用效益的贡献份额却达到43.06%。

分阶段来看，改革后6年的产出水平要比前6年稍为低一些，表现在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份额由19.7%下降到16.4%。这是由于：（1）改革前多年积累的增长潜力，在改

革开放政策下得到释放，使经济在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获得较好效益。（2）改革前期的指导方针比较稳健，各种经济关系相对比较协调，因而使经济增长的效益较好。（3）改革后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配套性改革跟不上，使经济体制的整体功能得不到体现，因而损害了经济增长效益。

## 二、经济增长因素的评价和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以来上海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经济增长是依赖于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难以摆脱“投入多、效益低”的增长格局。为了对上海经济增长因素作出更为恰当的评价，现通过国际比较后再取得认识。表2列出了上海经济增长因素作用率与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原联邦德国等国家的比较。

表2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国际比较 单位：%

	上 海 1979~1990年	韩 国 1963~1976年	日 本 1953~1971年	美 国 1948~1969年	加 拿 大 1950~1967年	原 联 邦 德 国 1950~1962年
国民收入增长率	7.20	9.28	8.81	4.00	4.95	6.27
总投入耗费	5.90	5.68	3.95	2.09	3.02	2.78
劳动投入	0.32	3.47	1.85	1.30	1.85	1.37
资本投入	5.58	2.21	2.10	0.79	1.14	1.41
单位要素投入产出水平	1.30	3.60	4.86	1.91	1.93	3.49
资源配置	-0.3	0.71	0.95	0.30	0.64	1.01
劳动要素投入增加贡献率	4.44	37.39	21.00	32.50	37.37	21.85
资本要素投入增加贡献率	77.50	23.81	23.84	19.75	23.03	22.49
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率	18.06	38.79	55.16	47.75	39.60	55.66

资料来源：上海以外的数据见金光锡、朴峻卿：《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根据表2，可以对上海经济增长因素的特征作以下几点评价：

1、上海经济的增长是依赖于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1978~1990年上海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7.2%，与对比的国家相比，处于“中速”的地位，但是由全部要素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达5.9%，占总经济增长率的81.94%，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原联邦德国的44.34%、日本的44.84%、美国的52.25%和加拿大的60.4%，也比发展中国家韩国的61.2%高出20多个百分点。显而易见，上海经济总量主要是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而取得增长的，仍然是外延投入型增长的基本格局。

2、上海经济增长是以资本投入型增长方式为主体的。从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总增长的贡献份额（或称作用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要高于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劳动要素投入贡献份额一般为资本要素投入贡献份额的1.6倍左右。而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的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基本接近，资本要素增长略快一点，两者的贡献份额均在21~23%之间。相比之下，上海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过快，对经济总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77.5%，远远超过这些对比国家22%的平均水平。反过来，上海在这12年中的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却很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只有4.4%。资本要素投入贡献份额是劳动要素投入贡献份额的17倍，从而表明了上海经济增长因

素的主体是资本要素投入。可以认为，上海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入的增长所带来的，在投入中又是以资本投入为主所带来的。对于我们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相对十分短缺的国家来说，这种资源配置状况显然是不合理的。

3、上海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偏低。从对比表中还可以看到上海经济增长中这样一个特征：单位要素产出水平，即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最慢，12年中平均每年增长1.3%，而韩国、日本、原联邦德国都在4%左右，特别是日本从1953～1971年的19年中，每年平均增长4.86%，是上海增长速度的3.7倍。从另一角度来分析，上海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总增长的贡献份额是18.06%，1/5还不到，而日本、原联邦德国已经超过50%，美国接近50%，韩国和加拿大也均在39%左右。显然，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非常低，这主要是资源配置、资本使用效益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决定的。就资源配置这一状况来分析，上海资源配置改善不大，不仅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反而每年下降0.3%，而韩国却增长0.71%，日本增长0.95%，美国增长0.3%，加拿大增长0.64%，原联邦德国增长1.01%。

根据以上的几点评价，可作出以下总体认识：1979～1990年上海经济增长是以资本投入为主、效益贡献份额下降为特征变动的，形成了一个“投入多、效益低”的经济增长格局。

### 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启示

改革以来，上海经济所形成的“投入多、效益低”的增长格局，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方针，是整个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上海经济进入90年代之际，仍然应该把经济增长从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换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把经济工作逐步走上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就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得到的认识，应注意和处理好两个问题。

#### 1、国民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率不断上升的基础上，才能使经济增长保持良性循环。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来取得的，并且以这些投入的大量增加来支撑经济增长，则必然要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率的下降。上海从1978年以来的积累率除1983年为37.2%以外，均超过40%以上，最高达54.7%。1988年以后逐步下落，到1990年为45.6%。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来看，1979～1984年的投入产出增长水平明显低于1985～1990年的增长水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而技术水平的相对停滞和技术装备的相对老化又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影响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很容易使经济过热，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益下降、需求膨胀和结构失衡。因此，上海国民经济要保持良性增长，必须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要创造一个总量供求平衡和结构关系比较协调的经济环境，同时，加快技术进步，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规模效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较快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不断提高，既要解决经济增长，更要解决效益问题。上海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资金短缺、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下降、技术进步步伐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需要一定的投入，以保持适度的增长，但反过来，不解决效益问题，经济的增长就会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不少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时，虽然是以资本

投入型增长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但与我国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投入产出水平不同，这些国家是以“高效益”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持续平稳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发展将被推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如何使上海经济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就必须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应力求走一条“高速度、高效益”的增长道路，不仅注重必要的要素投入，更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

## 2、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金短缺的国家，投资往往带动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能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而且投资支出的本身又形成对其他关联部门的推动，所以这是不少发展中国家依靠提高投资率本身来获得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投资理论告诉我们，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及投资效率成正比。如果在投资率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效率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就说明要使经济增长，既要增加投资数量，又要提高投资效率。随着科技进步，提高投资效率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大。上海在1979～1990年间，物质生产部门的资产总额扩大2.8倍，但是，同时期的资本产出率却下降33.9%，可见，上海的资本效益状况并不理想。

就投资本身来说，不仅有效率问题，还有规模问题，如果投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益的下降、需求膨胀和结构失衡。那么，投资规模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怎么确定？我们认为有两条依据可以判断：（1）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2）投资增长是否超过经济增长。根据上海的积累率、资本产出率、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等因素分析，我们认为以后10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划为三种状态：5%以下为低速增长，6～13%为中速增长，14%以上为高速增长。我们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6～9%之间称为适度增长。如果投资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不超过这一区间，则投资规模比较合理；如果投资增长接近或高于14%以上，则投资规模偏大或者出现投资膨胀。

控制投资增长速度对经济稳定和协调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就目前上海来说，提高一定的投资率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多的投资增长又会导致投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益的降低，这就需要使投资率保持在适度水平上，即适当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确定之后，扣除价格因素的投资率一般不能超过经济增长率。同时，投资的结构应向技术改造、技术更新和科技发展方向倾斜，在增加生产能力的同时更多地推动技术进步，这样才能使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协调起来，保证经济的有效增长，从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

---

（上接第53页）即使不成功，对社会的震荡也不大。2. 在中长期阶段，抓住企业改革、住房改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契机，推动发展以此有关的各种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失业基金、储蓄贷款协会（住房融资机构）等，并鼓励这些机构进入证券市场。此时，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但未进入成熟期，证券交易的风险仍较大。而上述金融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经营活动不仅关系到经营者自身的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所以，对这些机构投资者一方面要加强管理，主要通过立法，限制其活动范围以减少风险。如禁止对投机性证券的投资，经营资产要有一定比例的流动性以备支付等。并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和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要对这些机构投资者实施强制保险。一批新兴金融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发展和壮大，证券市场才可能真正发挥功能和进入稳步发展阶段。